

通俗經濟學

倫納德·西爾克著 楊懷康譯

Leonard Silk
ECONOMICS IN
PLAIN ENGLISH



通俗經濟學

倫納德·西爾克著

楊懷康譯

ECONOMICS IN PLAIN ENGLISH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economics

— in language anyone can understand

Leonard Silk.

Economics in Plain English: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economics-in language anyone can understand by Leonard Silk.
Copyright ©1978 Leonard Silk.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January 1981

通俗經濟學

倫納德·西爾克著
楊懷康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95217號
(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

港澳總代理：張輝記書報社
香港利源東街4號2樓

台灣總代理：學生英文雜誌社
台北市金山街103巷29號
登記證局版台誌字1134號
郵撥帳戶110978號

1981年1月(香港)第一版
1981年1月(馬尼拉)第一次印刷
封面設計：蔡浩泉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附錄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目錄

序	經濟學是否不可或缺？	一
	經濟學家爲何意見不合？	三
	經濟學的語言	十一
	基本概念	二十七
	市場	三十七
	國民經濟	四十七
	世界經濟	五十九
	經濟學投入活動：政府	七十五
	經濟學投入活動：商業	八十七
	經濟學能爲你做什麼？	一〇五
	經濟學的前途	一二二
	統計學概念	一三三
		一四一

序

本書假定經濟學的一切主要概念都可以簡單道來。幫助你明白經濟學，使之切實可行，符合你的最佳利益，是本書的目的。

經濟學的抽象語言和理論，使許多人感到枯燥乏味，不值得花費精力鑽研。對一般人而言，經濟學的大量著作，確是和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著作一樣，枯燥乏味。

但經濟學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如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所說的「日常生活事務」——實在太重要了，不能推誘過於艱深而置諸不理。經濟學不一定枯燥。應用經濟學的理論解決你以及其他人士在生活上的實際問題，可以使人油然佩服，得到鼓舞……而且有用。

第一章

經濟學是否不可或缺？

答案不幸是，經濟學不可或缺。

人類幾百萬年來的進化，正如人類學家布諾斯基（J. Bronowski）指出，固然沒有經濟學的幫助。但資本主義和工業主義的雙重革命，使無數的生產者及消費者，以一個近乎統合的經濟體系結合起來，並且激發人們的好奇心，想知道這個經濟體系，它的中央情報資料毫無管制而又缺乏指引，如何能夠達到目的。

古典經濟學家如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及其追隨者，驚嘆於這個體系的靈活運作，冥冥中有隻無形之手在指引經濟活動。當時，「放任無爲」是經濟學的格言。

但後來，當這個體系出現了崩潰的跡象，繁榮、通貨膨脹、經濟衰退和失業有大幅度的波動，不少「修補匠」便相繼亮相了。在十九世紀，最著名的「修補匠」便是馬克斯，他以爲資本主義體系不斷擴展，要治療它的經濟波動及消滅窮人所受到的極端不公，其辦法是掃除新與

資產階級的權力基礎——私有資本主權。馬克斯認為在資本主義下吃盡苦頭的工人階級——財富的真正創造者——應該集體管理經濟事務。多年來學院派的經濟學家——非學院派的經濟學家絕無僅有——跟隨史密士，反對馬克斯，視馬克斯為社會暴亂、政治獨裁、經濟失效的使者。俄國革命以馬克斯之名發難，但革命的苦果只進一步鞏固了資產階級對「放任主義」的信心。

但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大不景氣，替放任主義經濟帶來了內部的思想革命，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做了這次革命的舵手。

正如馬克斯所預言，資本主義似乎已面臨崩潰。但凱恩斯却以為可以透過政府有限度的干預，以增加商品及服務行業的貨幣需求的辦法消除失業，挽救資本主義。凱恩斯的辦法加上第二次大戰時政府要大量支出，果然將大不景氣治好了。

不幸得很，這個穩定經濟的方案却帶來了持續的通貨膨脹。以減低政府開支的辦法却又會帶來經濟衰退及提高失業。這就是我們當前面對的境況，為失業或通貨膨脹，或兩者兼而有之所擾。

經濟學家以為經濟學是對付這些問題的不二法門。非經濟學者說：「這東西有啥用！」但他們還是蜂湧而來，聽經濟學家診症下藥，傳道濟世。

社會的苦難，反而使經濟學家致富。做生意的人以高價請大量經濟學家做顧問，他們相信有人作不盡不實的預言總是聊勝於無。大眾傳播界緊隨著最有名的經濟先知。普通人可能覺得經濟學家使人煩擾，但其他社會科學家却因為他們的名氣，諾貝爾獎及對政治權力的接近而痛恨他

們。

但任何稍為涉獵過經濟學的人，都會成為普普通通的經濟學家。三十年前，賈伯（James Thurber）及懷德（E. B. White）曾經提出「性是否不可或缺？」的問題。馬仕德斯（Masters）及約翰遜（Johnson）已指出：「非性是性的一種形式」。非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種形式。經濟學是不可或缺的。

經濟學不但只不可或缺，而且更相當引人入勝。非經濟學家往往以為經濟學是沉悶的抽象概念，人類自己對經濟學的了解，也只在於抽象概念，成為只為增加利潤或增加福利的「經濟人」。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指責是對的，因為經濟學的歷史發展確是如此。但現代的經濟學家正在為人類找尋一個充滿人性的新模式。

關於這個模式，不妨以李保·比士特茲基（Leibel Bistitzky）為例。他在曼哈頓下東部厄色克斯街（Essex Street）二十七號半開設了一間猶太雜貨店。每日下午四時比士特茲基先生便關門，以便鄰近的正統教猶太人可以在他店內舉行下午祈禱。「紐約客雜誌」的記者引述比士特茲基的鄰居所說：「他是性情中人。他還有二十個顧客在店內，他却要關門。誰會這樣做呢！」

經濟學是否需要比士特茲基這樣的人呢？這樣的人是否過於複雜呢？早期的經濟學家體會到「經濟人」只不過是個抽象概念，但他們以為經濟學需要一個「理性的模式」來研究人們促進物質利益的行為。「自利」和達爾文的物競天擇及牛頓的地心吸力一樣，具有強大的說服力，是

任何科學所致力追求的精簡概念。

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所著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是古典經濟學的結晶。他在該書替「經濟人」這個概念作出辯護：「宗教動機較諸經濟動機來得強烈，但對生活的影響却不及經濟動機般廣闊。人們在頭腦最靈活的時刻，通常是忙於處理謀生的事務。在這段時刻，他的工作能力，他的思想和感情，他與同事、僱主或僱員的關係，塑造了他的性格。」故此馬歇爾謙稱經濟學是「研究人類日常生活事務的學問。」

但在日常生活事務裏，講求增加利潤的「經濟人」能否替人類行為提供一個真正的模式呢？以一個公司經理而言，他會不會先考慮公司的利潤或股東的紅利，然後才考慮他個人的收入、財富、地位及特權利益呢？

到底一個工人會否着重增加工資，多於着重工會團結呢？（這種團結的動機可能出於對團體利益的關懷，擔心工作的保障，亦可能出於懶惰遲鈍，或對工作生厭。）

到底消費者在通貨膨脹下會不會在物價上升之先盡量搶購囤積呢？還是在通貨膨脹的心理壓迫下削減開支增加儲蓄呢？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李賓斯坦(Harvey Leibenstein)認為要確切解答這些問題，先得要大大修改現存的經濟理論。他認為「選擇理智」(Selective Rationality)是解釋人類經濟行為的基本心理學概念。「選擇理智」理論認為，經濟決策的基礎是人們的意願行為及人們在沒有規限下的慾望行為的折衷。

根據這個觀點，人們的意願行為，是決定於社會標準——或以佛洛依德的字眼來說，是決定於個人的「超我」（Superego）。

但在沒有規限下的慾望行為是決定於人們的內在傾向——食、色、金錢、權勢——佛洛依德所說的「本我」（Id）。

一旦我們接受了一個更充實、更實際的模式來解釋人類行為，體認到經濟活動的主要推動者，是實實在在的人，有內心矛盾，有思想混亂，還有自我、原我及超我——各自爲了利益而互有衝突，對社會標準和道德有所擔心，那麼我們便要大事修改絕大部份的傳統經濟學理論。

人是否常常貪得無厭還是知足呢？尤內基——梅隆大學的西蒙教授（Herbert Simon）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指出商業經理的行為是在於「滿足」某些特定的利潤準則，而不是盡力爭取最大的利潤。他們妥協於社會壓力，勞力需求，股東壓力，個人利益及賺取足夠的利潤以保證公司的生存，而且可能的話，還妥協於公司的成長。

傳統的經濟理論將商業機構描繪爲一心一意，朝著明顯目標進發的統一體。但公司的共同意志並不存在。倘若我們將目標集中在每個人的內在動機及矛盾，許多公司的不合理行為就較易了解了。一個經理對公司的貢獻可能很大，但倘若總裁視之爲眼中釘，他便可能會將之解僱。同樣，一個公司的決策人可能爲了一己的自我，或個人利益而任意收購一間虧本的公司。

傳統的理论將一間公司的首腦與手下的利益，視爲等同。但不少貪污、賄賂的案件已證明，首腦與手下的利益並不一致。高富石油或洛歇飛機某些愚蠢或不合理的行為，對「甲」手下或「

乙「首腦而言，可能是合理不過的事。

譬如說，傳統經濟學家可能以為消費者在通貨膨脹時期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的行為是不合理的。但我們一旦放棄傳統經濟學單純的假設（理智的人應該在價格尚未上升之前增加購買量），消費者不願在通貨膨脹時期購買的決定可能便會變得頗為合理了，起碼足以諒解。密歇根大學的卡圖納教授（George Katona）解釋說：「倘若人們對其處境滿意，他們便會增加開支；反之，他們便會減少開支。通貨膨脹令人感到不安；就他的收入的增加而言，價格上升便意味著生活水平的下跌，或生活上的改進不如理想。」

一般而言，人們都認為收入的增加是個人努力而不是通貨膨脹的結果，故此他們怨恨通貨膨脹。即使他們收入的增加較諸物價的上升還要大，他們仍然有被欺騙的感覺。他們的反應是減少開支。

通貨膨脹也會使人對前景感到不安，這種心態會促使人們儲蓄。他們總是覺得要儲備多些錢以備將來購買必需品之用，故此現在便不應在奢侈品上多作開銷。

人們也可能爲了子女設想——譬如準備將來大學學費的上升——在通貨膨脹時期減少眼前的支出。超我可能會戰勝原我，但有時原我也會獲勝。矛盾和衝突是永遠存在的。

理性的效用

經濟理性對於了解和解決各種衝突和難題也不是毫無用武之地。就通貨膨脹而言，商業界的

行為便和傳統經濟理論吻合，倘若價格可能上升便多買，倘若價格可能下跌便少買。近年來通貨膨脹劇升，消費者減少開支，增加儲蓄；商業機構期待價格上升而增加存貨，一旦價格下跌，他們便削減存貨。

市場的壓力往往迫使做生意的人根據理性行事。爲了增加利潤，他必須要決定商品的市場，維持、削減或提高價格，是否要增減廣告開支，或增減推銷員的數目。

在競爭壓力下，他必須要設法減少做生意的成本、費用，他必須要決定是否添設機械以增加生產能量，設法以成本較低的材料替代價高的材料；僱用足以應付開支的工人；能夠增加利潤固然更佳。

他要留意工業發展可能帶來的新機會，一旦有這樣的機會，他便要決定是否改變生產方式，或透過研究製造新產品。他要確定是否有足夠的生產能量以應付需求；是否有足夠的貨倉存儲貨品，是否有足夠的發行量將貨品供應給可能的顧客。他必須要不斷密切注意財政狀況。

要對這些問題提供答案便要收集資料，分析經濟及財政記錄，作出理智的商業決定，將對未來的揣測應用在行動上。商人所生活的世界並不能精確衡量，他必須要有依賴本能的勇氣；但毫無疑問，明確的經濟資料及分析可幫助他作出較佳的商業決策，及減少他所面對的各種不確定的事物，使他的生意興隆。

故此理性是會繼續存在的，而商人也一定會斤斤計較。但他們也愈來愈受到政府及公共組織的限制，此外他們也許受到社會標準的內在壓力，不管這些社會標準是佛洛伊德所說的超我，或

良心——寂然中有個微弱的聲音在訴說你可能會受到懲罰。

在同樣有限制的環境下，個人也爭取在開支上作出理智的決定。爲了增加個人的滿足感，他們在各項開支斟酌增減——隔熱材料的開支增加，加熱設備的開支就減少；蔬菜的開支增加，肉類的開支就減少；多些蕃茄汁，就會少些伏特加酒（譯者按：蕃茄汁和伏特加酒是用來調拌一種鷄尾酒，名爲「血紅的瑪利」Bloody Mary）。

以國家而論，也是如此。作出理智經濟決定的權力，影響各國處理從失業到戰爭等國內及國際問題的能力，故此也影響各國的發展或衰退。

經濟理性不是人類的敵人，它是人類的朋友。

第二章

經濟學家爲何意見不合？

經濟學家想要做的事，與其他科學家沒有多大的分別——觀察社會或自然界某些現象，搜集資料以衡量這些現象，構造理論以解釋這些現象，然後從客觀事實求證這些理論。但總括而言，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功夫都做得不好。一般而言，他們的時間都花在參閱同行的著述而非觀察社會現實。他們的資料貧乏，而他們又不肯花時間設法將之改進。他們的理論死板及機械化，但除非在學術及政策上出了嚴重的亂子，他們總是敝帚自珍，不肯輕易放棄。

經濟學是否一門科學？

作爲一門科學，經濟學的缺點是不可以完全歸咎于經濟學家身上的。經濟學有異於一般自然科學，如物理學。經濟學家不能從一個有條不紊的「封閉」體系研究經濟現象。物理學家所研究的原子結構，可以不受「外界」的騷擾，擺脫諸如國家選舉，戰爭等外界事物。但經濟學家不可

能不考慮任何與經濟體系有關的事物。經濟體系是「開放」的，受政治風暴、社會、心理，甚至氣候轉變的影響。經濟學家無法預測這些轉變，故此經濟預測往往站不住腳。經濟學家對現實的理解能力也不穩固；他們那些看來嚴謹精確的數字，不過是閉門造車，流於膚淺，反映事態背後的趨勢和動向毫不準確。廢除經濟統計數字的小數點將會是一項有意義的改革。

經濟學家的社會及政治偏見和價值觀，不論是有意識或是潛意識，使經濟學達致科學客觀化的問題更惡化。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呢？是史密斯、馬克思、耶穌或是女作家蘭德（Ayn Rand）的信徒呢？他是否與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或中產階級認同呢？他是精英主義者還是民粹派呢？

他是否相信政治自由必須建築在經濟自由之上，而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帶來經濟自由？又或者他認為在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大企業會剝奪政治及經濟自由？

他是否認為社會是階級之間不斷鬥爭的產物，而政府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又或者他認為在民主社會，政府能促進公共利益？

所有這些問題不僅是科學問題，它們也是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問題。

倘若經濟學家能夠不擺出一副唯科學主義的偽善臉孔，明確說出他的政治和社會價值觀，也許對他們會有幫助。但不幸得很，一些隱藏的偏見以及為利益是尚的政治或經濟動機，往往對經濟分析和政策產生了惡劣的影響。

經濟學是否宣傳工具？

我們致力於建立客觀的經濟學已有一段很長的時期。溯自十六、十七及十八世紀，在史密斯以前的時代，第一代的經濟學家主要是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在經濟思想史上，他們是「重商主義者」。他們的經濟學是爭取本身利益的工具，和近代的商人一樣，他們認為本身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前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威爾遜（「Engine Charlie」Wilson）的名言：「對國家有好處的東西，對通用汽車公司也有好處，反過來說也是一樣。在一六二一年，東印度公司的經理托馬斯·曼（Thomas Mun）對這個概念有稍為不同的註釋，他說：「一個國家就像個大家庭。」

對重商主義者而言，對個人有好處的東西，對整體也有好處。故此，猶如商人積累財富會有好處，國家也應該積累財富。所以一個國家應該採取節省多於開支，輸出大於輸入的政策。倘若一個國家這樣做，黃金就自然會流入為該國結帳。有利的貿易差額——貿易出超——是國家致富的途徑。

英國及其他追隨重商主義的國家，試圖對入口貨品課以重稅，並且設立商船專利壟斷的辦法排拒外國商品，以求積累財富。各國競相爭取盈餘（這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最後的結果是使貿易減縮，各國不但沒有增加財富，反而更窮。

阿當·史密斯的美好世界